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汤一介
赵建永
编

汤用彤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汤一介

赵建永

编

汤用彤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汤用彤卷/汤一介, 赵建永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300-20685-1

I. ①中… II. ①汤… ②赵…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汤用彤 (1893~1964)-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815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汤用彤卷

汤一介 赵建永 编

Tang Yongto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32.75 插页 2

字 数 549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汤用彤先生（1893.8.2—1964.5.1，字锡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佛教史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学贯东西、会通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的代表之一。他身处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这种过渡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用彤先生的全部思想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实现新旧顺利过渡的时代问题为其核心，并推动了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新陈代谢，从而使其学术人生鲜明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可谓中国学术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一、思想酝酿——新旧过渡

（一）新旧教育

用彤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他中年时用“幼承庭训，早览乙部”来描述自己的家学传统教育。1908年，用彤先生随父亲来到北京，就学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该学堂前身是戊戌维新时期就开始筹设的顺天府中学堂。用彤先生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用彤先生在戊班，梁漱溟在丙班，张申府在丁班，李继侗与郑天挺在庚班，一个年级为一班。他尝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之书与佛教典籍。稍早考入顺天学堂的梁漱溟，当时名梁焕鼎，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用彤先生等昔日中学同窗。

1909年7月，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同时筹备附设肄业馆，让各地考选来的学生在此学习留学相关知识。1911年3月，用彤先生与吴宓分别从北京顺天学堂、西安宏道学堂考入刚成立的清华学堂中等

科。两人性情虽异而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很快结为契友。他们心系国家之兴废存亡，极其注重道德品性的修养，常互相督促，一起切磋文章道义，畅谈人生。用彤先生在清华期间阅读中外图书甚多，经常发表读书心得，多醒世警言和奇思妙想，揭示出社会、哲学、宗教学乃至科学的不少重要问题。

用彤先生在清华打下了国学和西方语言、科学等西学的扎实基础。1914年，他担任清华学校达德学会刊物《益智》的总编辑，于1916年至1917年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后任该刊顾问，还曾担任1917届学生年级手册编辑。由于用彤先生工作出色，1917年6月荣获金奖。用彤先生在清华1917年夏毕业，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因治疗砂眼而缓行一年，以学生身份留校任国文和中国历史课教员。由是钱穆认为“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亦可想见”^①。

（二）留学美国

1918年，用彤先生入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他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本科留学生活既紧张又充实，仅一学年（9个月）就获得文学士学位（B. A.）。当时汉姆林大学校报上面曾有两篇关于他的报道。因其学绩出类拔萃，被荐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陈寅恪、用彤先生与吴宓均在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就学于哈佛大学，分别主攻比较语言学、哲学和文学。他们虽学业和性情殊异，却志趣相投，文化理念契合，初识就引为知己，相交莫逆。又因三人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中成绩优异，学问超群，名噪校园，故而被誉为“哈佛三杰”。自此，他们便在学术上切磋共进，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贯穿一生的深厚友情，演绎了一系列激励后学的文坛佳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三座巍峨连峰。

1922年1月，梅光迪、刘伯明、吴宓、胡先骕、柳诒徵等人于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用彤先生回国前，吴宓邮寄《学衡》各期并随长函至其哈佛寓所。《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芳吉、刘朴等，均为《学衡》撰稿人。

由于国家对人才急切的需要和友人的热诚邀请，用彤先生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及早回国效力。他在哈佛师从白璧德、兰曼、

^① 钱穆：《忆锡予》，《燕园论学集》，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佩瑞诸泰斗，其所受科学训练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和方向。他留学哈佛时的未刊英文手稿，现存哲学、宗教学、逻辑学三辑共五册，16开本。这五册厚重的文集满载着他从哈佛学到的学术精神和方法，都被带回并扎根于国内学术界，通过他教学南北的传授，丰富并深化了当时的文化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为现代中国学术奠基的历史作用。

二、学术初创期——探求真理

1922年夏，由梅光迪、吴宓推荐，用彤先生应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之聘，回国出任哲学系教授，随后任系主任。他学术工作主要从协助吴宓办理《学衡》杂志，讲授东西方哲学史、宗教史，译介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撰著三方面展开。此间，归国留美生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主导力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中国教育师资尤其是高等教育师资严重匮乏的燃眉之急，也一改过去中国高等教育多聘外籍教员甚至主持校政的现象，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当中包括用彤先生在内的一些人更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和学术大师，在此后的文化教育革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功甚伟。

（一）东南大学时期

在东南大学期间，用彤先生的各项学术活动都是围绕落实学衡派的理念来展开的，因此这一阶段在他的思想分期上可称之为学衡时期。用彤先生刚回国时，恰逢欧阳竟无经过数年筹备的支那内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10月17日，支那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欧阳竟无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集，梁启超赴金陵受业兼旬，张君勱亦负书问学。一时名流如吕澂、姚柏年、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黄树因等，皆拜投欧阳门下学习唯识，用彤先生于课余亦前往受学。内学院初建即英才荟集，一时声誉鹊起，与太虚法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相辉映，成为全国两大佛学中心。

1923年9月，内学院研究部分设的正班和试学班开学，用彤先生参与主持其事。招收学员二十六人，其中正学班十人，试学班十六人。学制均为二年，试学班结业后，成绩及格可升入正学班。研究部有如现在的研究生院，实行导师制，招收学生十儿人，通习唯识要典。以用彤先生博学，受聘为研究部导师。每两个月开研究会一次，发表研究成

果，年终则编印年刊及杂刊。将内学院办成佛教大学是欧阳竟无的理想，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故先从试学班开始，由欧阳渐、用彤先生、邱稀明、王恩洋、吕澂、聂耦庚六位导师指导。

同年，内学院院刊《内学》在南京创刊，由欧阳竟无主编。用彤先生的《释迦时代之外道》发表于《内学》第一辑。《内学》年刊是富有纯粹学术价值的佛学刊物，专门刊登国内佛学名家和学者如用彤先生、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等人的研究心得，反映出当时佛学研究的水准。举凡收集20世纪最有价值的佛学成果和了解现代中国佛学的早期发展及其方向，必离不开此刊。此刊第四期以后，以《内院杂刊》的形式继续出版。

1924年，用彤先生任内学院巴利文导师。1月至6月，他指导“《长阿含游行经》演习”一课。2月，他最早的佛学论文《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发表于《学衡》第26期。9月至12月，他开讲“金七十论解说”及“释迦时代之外道”两课程，这两门讲义整理成文皆刊于《内学》杂志。1925年7月，自1923年9月开办的内学院试学班，在用彤先生赴南开前夕圆满结束，共有蒙尔达、韩孟钧、刘定权、谢质诚、李艺、邱仲、释存厚、释纂觉、黄通、曹天任、陈经、黄金文、刘志远、阎毅、樊毅远、释碧纯16名学员顺利毕业。

汤用彤讲授过旧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在东南大学开设的课程有：哲学史、唯心论、反理智主义、伦理学、印度学说史等。这一时期（1922—1925），他培养的学生有向达、陈康^①、范存忠、严济慈等人。

（二）南开大学时期

1925年8月，用彤先生在张伯苓的感召下，受聘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素有“家庭学校”之誉，实行教授治校、师生合作的校务管理方针，家庭温情的魅力召唤了大批著名学者加入南开大家庭。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特邀用彤先生、范文澜、蒋廷黻、黄钰生等教授做顾问，成为师生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该刊主编开篇语中讲，所请的九位顾问“除指导一切外，并须自己做文章”。用彤先生应邀撰《佛典举要》发表于《南大周刊》两周年纪念号。

在南开哲学系期间，用彤先生主讲过该系几乎所有课程，如西洋哲

^① 汤用彤在东南大学时的讲义里古希腊哲学文化占相当比重。在他的影响下陈康走上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道路。参见汤一介：《汤用彤先生与东南大学》，载《光明日报》，2002-06-14。

学史、现今哲学、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教育、康德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纲要、伦理学、印度学说史、印度哲学、宗教哲学、佛学史等，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① 他培养的学生，如郑昕后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康德研究专家，江泽涵则成为著名数学家、学部委员。

（三）中央大学时期

1927年9月，用彤先生与钱宝琮、竺可桢等同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工作，出任哲学院院长。次年，用彤先生邀请熊十力来校讲学。此间是熊十力由佛转儒，奠定其新儒学体系的关键时期。1930年，用彤先生的一篇讲演发表于《中央大学日刊》，论述熊十力《新唯识论》及其思想的关键性转变。正是通过用彤先生的这篇演讲及其保存的熊十力讲义，学界才得以了解熊十力逐步扬弃旧论师说，形成新唯识论体系的过程。

用彤先生中央大学时期开设的课程有：19世纪哲学，近代哲学，洛克、贝克莱、休谟著作选读，梵文，《金七十论》，印度学说史，印度佛教初期理论，汉魏六朝佛教史等。当时唐君毅先生得列门墙，常与用彤先生讨论唯心论问题。用彤先生此时期（1927—1931）培养的学生还有程石泉、邓子琴、常任侠等人。1931年夏，用彤先生应胡适之邀，以美国庚款补助特聘教授名义，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他推荐下，宗白华继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

三、学术鼎盛期——圆融东西

（一）北京大学时期

1931年，胡适用英庚退款，以研究教授名义，聘请用彤先生至北大哲学系任教。“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时，用彤先生依然在红楼教室里给学生讲佛教史，并蔑视说“我的声音压过飞机的声音”。他认为天之不亡我中华，必不亡我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是在学术上的贡献，学人肩负着复兴民族文化的使命。因而他主张学术救国，通过文化的传承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战的信心。

用彤先生到北大后与冯友兰、钱穆、蒙文通、张东荪、梁漱溟、林

^①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一九一九—一九四九）》，14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宰平等入更是时相过从，切磋学问。用彤先生为人温润，宽厚平和，与人为善，拥有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他做学问极为谨严，对认定的学术见解颇为坚持，但与朋友聚会，他常默然，不喜争论。用彤先生与当时学者们相处友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他交好。熊十力在佛学、理学问题上常与吕澂、蒙文通相左，争辩不休，然均与其相得。梁漱溟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独用彤先生“每沉默不发一语”（钱穆语），绝非无学问无思想，性喜不争使然也。故钱穆赞其为“柳下惠圣之和者”。

对于中国 20 世纪的哲学学科而言，用彤先生最重要的贡献并不仅是他的哲学思想、学术体系和观点，还包括他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所起的推动作用。1934 年起用彤先生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主持系务 20 多年，北大哲学学科的教学研究方向和深度均与他本人的研究和领导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还主持文学院及校务 10 多年，奠定了北大文科教学研究的基础和特色。

1931 年至 1949 年是用彤先生学术思想的鼎盛期。对中古时期中外文化关系史全面深入的研究，使他在反思文化问题时具有更成熟的会通古今中西的特性和更为厚重的文化历史感。他到北京大学后每学期开两门课，中外并授，开讲中国佛教史、笛卡尔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研究（1935 年开设）等课程。1931 年至抗战前，他在北大培养的学生有任继愈、石峻、韩裕文、王维诚、王森、韩镜清、熊伟、胡世华、齐良骥、庞景仁、逯钦立等。

1935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用彤先生与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 余名哲学家出席会议，冯友兰致开幕词，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经过和意义。它的第一届委员会由用彤先生与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勱、范寿康、林志钧、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祝百英 12 人组成，用彤先生与金岳霖、冯友兰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会务工作。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的《历史演变中之形式与实际》、胡适的《楞伽宗的研究》、用彤先生的《汉魏佛学理论之两大系统》、贺麟的《宋儒的思想与方法》等，标志着中国哲学家各自创立学术研究系统的时机业已成熟。

用彤先生希望把北大哲学系办成会通中、西、印文化的学术重镇。从 1937 年该系聘任教授的名单，可以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当时聘任讲

授中国哲学的有熊十力、容肇祖，教授西方哲学的有张颐、贺麟（中西兼授）、陈康、胡世华、郑昕，并聘请印度师觉月教授来北大教印度哲学。

牟宗三晚年评论早期中国哲学界时说：北大“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再加上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搬到昆明，就成了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①。中国佛教史是用彤先生一直重点讲授的课程。他在北大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订、补充。1937年1月，用彤先生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今存）交胡适校阅，胡适称“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并荐之于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1938年6月，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50万字）。

（二）西南联大时期

1937年7月7日，抗战军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计划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用彤先生与贺麟、钱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取海道辗转于11月底到长沙，再转赴文学院所在地南岳衡山。1938年6月，临时大学转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用彤先生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后兼联大文学院院长、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1941年，用彤先生与陈寅恪、吴宓等人，同列教育部第一批部聘教授。1945年6月，蒋梦麟因赴任国民政府秘书长而离职，北大教授会推举用彤先生为北大代理校长。用彤先生一再推谢让贤，劝在美国的胡适返校主持工作。在胡适到任前，由傅斯年做代理校长。用彤先生在傅斯年赴渝开会时，代理联大常委职责。用彤先生时常出席联大常委会、校务会议、教授会，与各级领导精诚合作，共商决策，对各项学科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延续着中国教育的命脉，形成了西南联大的新风格，创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办学模式。

西南联大时期，用彤先生新开讲了9门课程：印度哲学史、汉唐佛学、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印度佛学通论。这一时期（1937—1946），用彤先生培养的学生有石峻、任继愈、冯契、王叔岷、张世英、汪子嵩、杨祖陶、陈修斋、王明、王利器、周法高、郑敏、宿白、杨

^①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卷，16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辛、许鲁嘉等，还有后来以老庄研究名世的杨柳桥先生也曾前来向用彤先生问学。

（三）复校北归

1946年，用彤先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协同傅斯年安排北大复校。北大复校扩建任务艰巨，机构繁多，任重事繁，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工作虽繁忙，但待人接物总是和蔼近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当时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用彤先生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与老一辈学者一道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和学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期间聘请张颐、贺麟、郑昕、游国恩、朱光潜、废名、季羨林等为教授。

1947年夏，他休假赴美国加州大学为客座教授。次年夏，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返回北平。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8年12月15日，胡适南下时委托用彤先生主管北大。胡适走后，北大没有了校长。北大教授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校务委员会，深孚众望的用彤先生被推选为主席，主持学校各项事宜，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此时，蒋介石制定的“抢救”知名学者计划，用彤先生被列入重点对象，并派飞机来接用彤先生等人南下。经地下党竭力挽留，加之师生们的信任，用彤先生决定留下来，履行校长职责，共济时艰，迎接解放，领导北大度过了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

四、新时期——暮年宏愿

1949年5月13日，北平市长叶剑英正式任命用彤先生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当时北大不设校长，尚未实行后来的党委制，校务委员会遂成为北大最高领导机构，一直延续到1951年6月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因此，在北大校史上都把用彤先生列为胡适之后，马寅初之前的校长行列。用彤先生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工作十分繁忙。他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与秘书长郑天挺共同为建设新北大尽力。

1949年9月，用彤先生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